

中國古輿服論叢

孫 机



文物出版社

孙
机

中國古輿服論叢

啓功題籤



文物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56号

封面题签 启 功

封面设计 仇德虎

责任编辑 许晓东

中国古舆服论丛

孙 机著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五四大街29号

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16 印张:23.25

ISBN 7-5010-0654-7/K·264 (平)定价:22.00 元

ISBN 7-5010-0655-5/K·265 (精)定价:30.00 元

目 录

上 编

始皇陵 2 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	(3)
略论始皇陵 1 号铜车	(17)
中国古独辔马车的结构	(25)
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	(51)
“弓形器”的用途和定名	(62)
辂	(69)
“木牛流马”对汉代鹿车的改进	(78)
唐代的马具与马饰	(83)
深衣与楚服	(105)
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	(116)
进贤冠与武弁大冠	(125)
汉代军服上的徵识	(146)
说“金紫”	(150)
幘头的产生与演变	(156)
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	(168)
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	(178)
中国古代的革带	(204)

下 编

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	(231)
凡 例	(231)

卷一	总序、车舆	(232)
卷二	冕服、朝服、公服	(271)
卷三	常服、其他	(324)
后记		(366)

上 编

始皇陵 2 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

1983 年 3 月间,承蒙临潼秦兵马俑博物馆和秦俑考古队给予便利,笔者有幸对 1980 年冬在始皇陵封土西侧发掘出土、此时修复工作已近完成的 2 号铜车进行了初步考察。这一组古文物瑰宝,不仅气魄恢宏、工艺精湛、装饰华奂,而且造型极其谨严、准确(图1—1)。全副鞍具包括像繁缨这样的细节,都用金属逼真地复制了出来。有些从前认不准的车器这次找到了归属,有些从前感到迷离扑朔的记载这次也被澄清,并用具体形象生动地阐明了。在过去发掘的逼真车马的陪葬坑中,这些部件却大都朽失无存。因此可以认为,2 号铜车的出土,无疑将把古车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。最近又获读此次发掘的简报,进一步弄清楚了一些问题,因志其一得之见,以求正于同志们。不过由于始皇陵并未正式全面发掘,有关葬仪、葬式的许多问题尚不明了,目前只能就车论车,先对它本身的形制作些探讨。

2 号车的一条辔绳末端有朱书文字“空车第一”。首字微泐,简报未释。按古玺文“安”字作 (《古玺汇编》1448 页)、 (同上书 4348 页),故此字应是安字。而 2 号车的御者又跽坐于前舆,证以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刘注引徐广“立乘曰高车,坐乘曰安车”的说法,则此车应为安车。但此车有容盖衣蔽,车型又当属于辘、辘之类。辘、辘二车,车型相近。《释名·释车》:“辘、辘之形同,有邸曰辘,无邸曰辘。”《宋书·礼志》引《字林》亦谓:“辘车有衣蔽无后辕,其有后辕者谓之辘。”这两种车在汉画像石和壁画中都有很清楚的表现(图1—2),并有车旁榜题为证^①。将它们的形制与 2 号车比较,其相同之处不难立辨。但在一般印象中,总觉得辘、辘是妇女乘坐的。《汉书·张敞传》:“君母出门,则乘辘、辘。”汉代的出行图中,乘辘车的也多是妇女^②。其实这种车男子也可以乘坐。《汉书·张良传》记张良对刘邦说:“上虽疾,彊载辘车,卧而护之。”这里的辘车正是《释名》所谓“载辘重卧息其中之车”之意。汉高祖与秦始皇的时代相近、地位相当,两人出行卧息也可能用同类型的车。所以 2 号车单从坐乘这方面来说,可以认为是安车;而从车箱构造这方面来说,又可认为是辘车。《古列女传·齐孝孟姬传》:“妾闻,妃后逾阃,必乘安车辘辘。……今立车无辘,非所敢受命。”可见辘辘可以包括在安车类型中。大抵安、立、辘、辘、辘、辘、辘等车的分类标准各不相同,其中有些名称是互相交叉的。如《汉书·平帝纪》:“立辘併马。”则辘车可立乘,应为立车之一种;又《霍光传》颜注:“辘、辘本安车。”则辘、辘又均为安车之一种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所记齐国战车有先驱、申驱、貳广、启、肱、大殿等,但这些不同的名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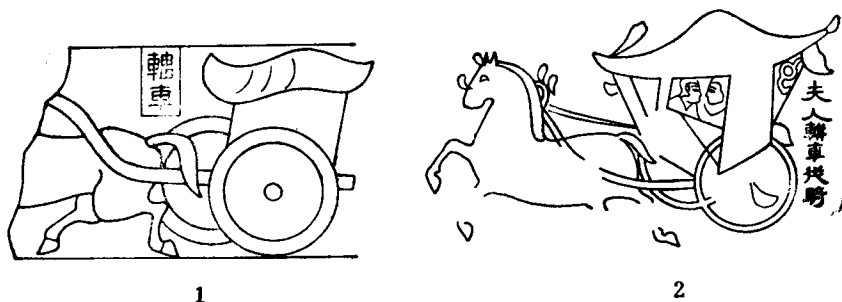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2 輜车与辇车

1. 潘祖荫旧藏汉画像石中的輜车 2.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辇车

可能只是依据它们在战阵中所居位置之不同而区分的,并非各自代表一种独立的车型。所以一辆先驱车,同时又可能是一辆轺车;而一辆申驱车,同时又可能是一辆轻车。鉴别 2 号车的车型时,也宜考虑到这种情况。

2 号车车箱两侧有可推启之窗,可能就是《说文》所称之戾。《户部》:“戾,輜车旁推户也。”《说文》下定义时遣词很有分寸,它不说戾是窗子,而说是推户。这是由于窗的本义是“通孔也”^③。窗字亦作“囱”。王力先生谓:“囱指天窗,即在帐篷上留个洞,以透光线。”^④可见窗子上起先是不装窗扇的,即使后来装了窗扇,直到唐代以前也多为固定的,不能开

启。而户却有可开合的“户扇”即扉。

因此,輜车侧面的推窗也只得称为“推户”了。2 号车的戾上还镂出了很细密的菱形孔洞(图 1—3:2),应即古文献中所称之绮寮或绮疏。如《西京赋》“交绮豁以疏寮”,《魏都赋》“曜日笼光于绮寮”,《古诗十九首》“交疏结绮窗”,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“窗牖皆有绮疏”,皆指此种镂孔纹样。因为寮是“小空也”,疏是“刻穿之也”^⑤,而绮则如《释名·释采帛》所说:“绮,歆也。其文歆邪,不顺经纬之纵横也。”据出土古绮标本观察,其织纹多呈菱形,也有呈复合菱形的,即所谓“杯文绮”^⑥(图 1—3:1)。后者与 2 号车戾上镂孔的形状更为接近。这种式样的镂孔窗扇战国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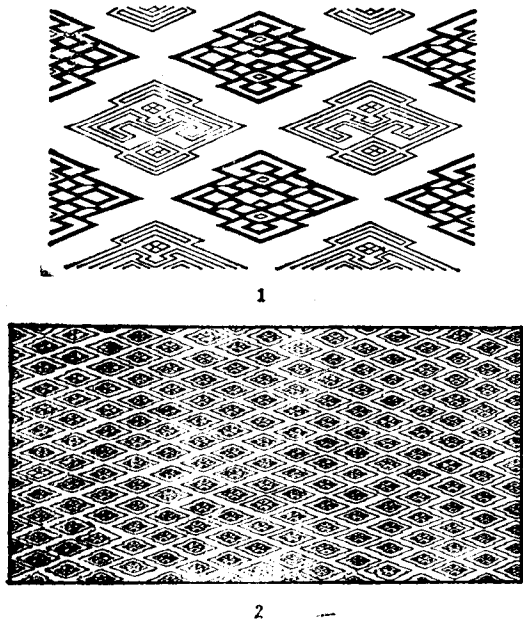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3 绮与绮寮

1. 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的杯纹罗绮 2. 2 号铜车的绮寮

已经出现。《楚辞·招魂》所称“网户”，王注：“网户，绮文镂也。”即是此物。但在汉代明器陶屋的窗子上反而不太常见，那上面往往只有直棂、斜格、穿壁等较简单的图案。虽然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陶仓楼在腰檐的栏杆上出现过与2号车戾相近之菱形镂孔^⑦，却也做得很粗疏。2号车戾上的绮寮为古建筑外檐装修的细部结构提供了例证。

2号车在车箱后方开门，与《周礼·巾车》“良车、散车”，郑注“谓若今辎车后户之属”之说合。其门扇左侧装银质拐形门栓（图1—4:1），应名为银户钥。《方言》卷五：“户鑰，自关而东陈、楚之间谓之键，自关而西谓之鑰。”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脩键闭，慎管籥。”郑注：“管籥，搏键器也。”可见它是一种有搏键装置的栓门之具。清·朱骏声说：“古无锁鑰字，凡键具皆用木不用金。”^⑧所以键^⑨、键、籥、鑰^⑩、鑰诸字可互通。户钥在满城1、2号汉墓中均出。2号墓所出者由内挡（或即键）、转轴与轴套（或即管）、把手（或即钥）三部分构成^⑪（图1—4:2）。因此它亦可名为“管键”（《周礼·司门》），户钥则是其通称了。而对于车来说，只有辎、辚等车型才有后户，才能装户钥。此物既然在满城1号刘胜墓出土，说明他亦用辎车类型的车从葬，这又可以作为男子乘辎车的一项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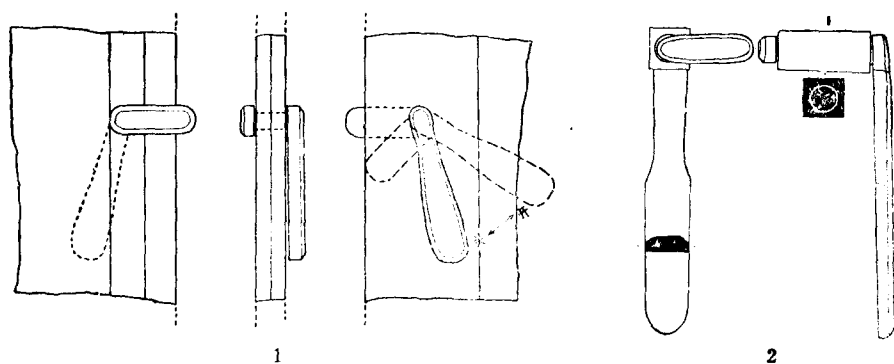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—4 户钥

1. 始皇陵2号铜车上的户钥（左，外视 中，侧视 右，内视） 2. 满城2号汉墓出土

2号车除金、银零件外，整体用铜制，唯于车盖上附有一层丝织物，当即《说文·巾部》“幪，盖衣也”之幪。车盖之有盖衣犹车杠之有杠衣，盖衣当蒙覆于盖上。但此车已有铜盖，不便再加铜幪，所以盖衣就直接用丝织物制做了。此车之盖呈椭圆形，顶部隆起，近似所谓鳖甲^⑫。它随车之纵深延长，这是因为其车箱为重舆，车盖要遮住前、后两节车舆之故。《隋书·何稠传》载：“旧制：五辂于辘上起箱，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。稠曰：‘君臣同所，过为相逼。’乃广为盘舆，别构栏楯，侍臣立于其中。于内复起须弥平坐，天子独居其上。”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：“玉辂，青质，以玉饰诸末。重舆。”从这些记载看来，似乎隋唐之辂才用重舆。其实早在秦汉的辎车上就能看到这种形制。山东福山东留公村出土的汉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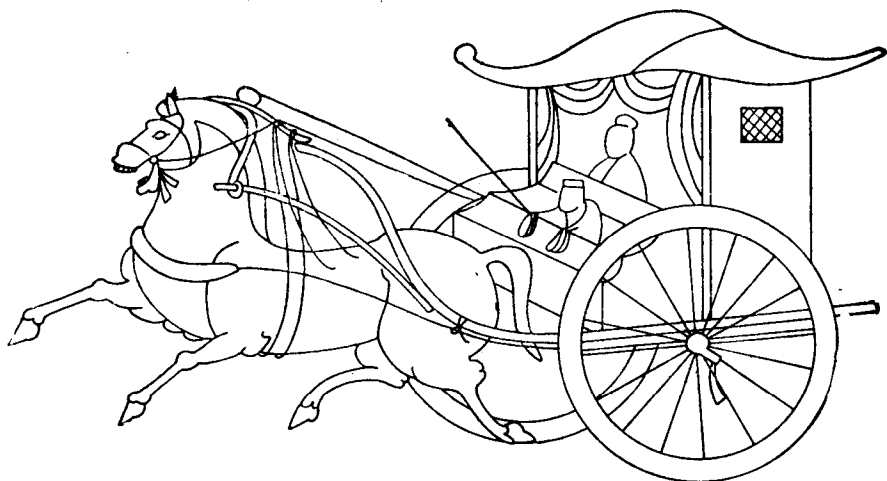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5 山东福山出土汉画像石中的重舆轺车

像石中之轺车，车箱分割为前后两部分，主人坐于后舆，御者在前舆（即缩或育）中执策驭马^⑩（图 1—5）。2 号车也是这样。不过此车的御者双手执轡，不像福山画像石的御者手中还拿着策。但 2 号车的策也出土了：铜质，竿形，带节，前端有短刺（图 1—6）。过去除了在画像石上看到代表策的一根线条外，出土的实例很少^⑪，一直不曾了解其细部构造，所以对于古文献中有关马策的记载不尽了然。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说：白公“罢朝而立，倒杖策，辍上贯颐。”高注：“策，马捶。端有针以刺马，谓之辍。倒杖策，故辍贯颐也。”倒拄杖策竟能将面颊戳穿，虽高注言之凿凿，读起来仍感费解。这次看到 2 号装刺的策，才知道白公是被它刺伤的^⑫。此物亦名箠，《说文·竹部》：“箠，羊车马箠也。着箠其端，长半分。”由于《释名》说羊车是“善饰之车”，所以段玉裁注箠字时谓：“善饰之车，驾之以快，驰骤不挥鞭策，惟用箠刺而促之。”按段说不尽准确，因为刺即辍本来就装在策上，不挥策何以用箠促马？而后代驱马所用之鞭，古代却主要用于殴人。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鞭作官刑。”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：“初，公有嬖妾，使师曹诲之琴，师曹鞭之。公怒，鞭师曹三百。”又《哀公十四年》：“成有司使，孺子鞭之。”《周礼·条狼氏》：“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。”郑注：“趋辟，趋而辟行人，若今卒辟车之为也。孔子曰：‘富而可求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。’”孙诒让疏：“鞭所以威人众，有不辟者，则以鞭殴之。”经典所记，鞭多用于人，罕用于马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说：“操鞭使人，则役万夫。”“代御执轡持策，则马咸弩矣。”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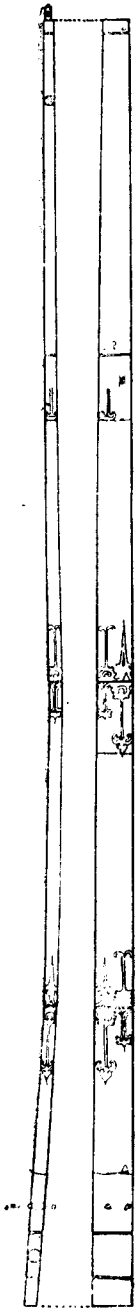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6 2 号铜车上的策

鞭与策对举，其用途的区别更是一目了然。故先秦、两汉之御车者一般并不挥鞭。所谓“左执鞭弭”等说法，乃是假殷人之具以釜马。唐以后，驱马始多用鞭，而装辂之策遂渐次隐没不见^⑩。

此外，2号车輿下的当兔和伏兔也值得注意。当兔位于辘、轴交会处。以前只见《考工记·辘人》中有“十分其辘之长，以其一为之当兔之围”的记载。戴震《考工记图》以为“当兔在輿下正中”。然而实物未见，在这里是第一次被发现。至于伏兔，在西周车上多呈展形或长方形，有时其一端且楔入轮輿之间的笠毂之套管中^⑪。然而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笠毂，其套管只做出上半边，呈覆瓦状^⑫，已不能约束伏兔。至战国时，笠毂更变成一端钉在伏兔上、另一端遮在毂上的扁平饰片^⑬。2号车上的笠毂承袭了这种做法，也只是一片从伏兔外侧接出来的板状物。而伏兔的断面近似梯形，上平以承輿，下凹以含轴。其状与清代戴震、阮元等人的推测颇相合^⑭。戴、阮等用这种形制解释《考工记》中的伏兔，虽未为得之，但对秦车的伏兔来说，却是言而有中了。

2号车车轴两端穿入毂中，毂长33.5厘米（图1—7）。如以铜车为真车之二分之一缩尺的模型，则实物约长67厘米。《诗·秦风·小戎》中提到“文茵畅毂”，毛传：“畅毂，长毂也。”2号车的毂算得上是畅毂了。畅毂延长了轮对轴的支撑面，行车时可更加平稳而避免倾覆。但长毂容易在两车相错之时互相碰撞，被称为毂击（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）、辖击（《战国策·齐策》）或简称为𦨇（《周礼·野庐氏》、《说文·车部》）。这许多的专用词汇也反映出行车时此种情况经常会发生，所以孙子说：“军行患车错之。”^⑮战国战车有时“尽断其车轴末”^⑯。可见战国战车开始采用短毂。但长、短毂各有利弊，亦即《考工记》所谓：“短毂则利，长毂则安。”2号车采用长毂，是出于要求行车安稳的考虑。2号车之毂饰以弦纹和锯齿纹，当即《周礼·巾车》“孤乘夏篆”、《考工记·轮人》“陈篆必正”之篆。先、后郑都把篆解释为毂约。毂约又称轆约。《说文·车部》：“轆，长毂之轆，以朱约之。”《广雅·释詁》：“约、缚，束也。”此字或从革作轆，即《轮人》中提到的轆革。用它束于毂周，即《诗·采芑》孔疏所说：“以皮缠束车毂以为饰，而上加以朱漆。”其实毂本用木材制作，缠革涂漆是加固之需，并非单纯为了装饰。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墓之车马坑所出8号车，其毂之轆端向里有8道凸起的环棱。制车时曾在环槽中施胶，缠以8道皮革，干后再打磨涂漆，从而增强了车毂的坚固程度。这是古车陈篆的实例^⑰。2号车之毂以弦纹和锯齿纹为篆，仍接近缠缚皮革所形成的纹理。此外，2号车在毂端的轳上还系有幡状飞轳。《急就篇》颜注：“路车之辖施小幡者，谓之飞轳。”这种形制在这里得到了印证。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说，皇帝车上的飞轳要画苍龙白虎等花纹。但汉画上所见之飞轳常是两条幡状短飘带，不便再施绘画，只有呈幡状才符合需要。以前在甘肃平凉庙庄秦墓出土的车上发现过珠帛飞轳^⑱，似乎秦车颇重视飞轳。此物一般用布帛制作，不易保存，他处少见其实例。

再看鞅具。2号车之繁复精致的鞅具为研究系驾方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，许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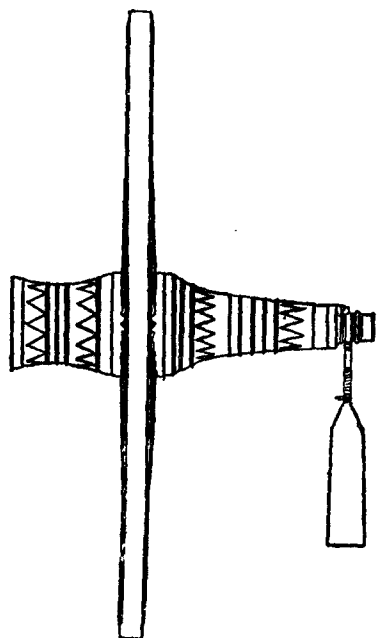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7 2 号铜车的轂、害与飞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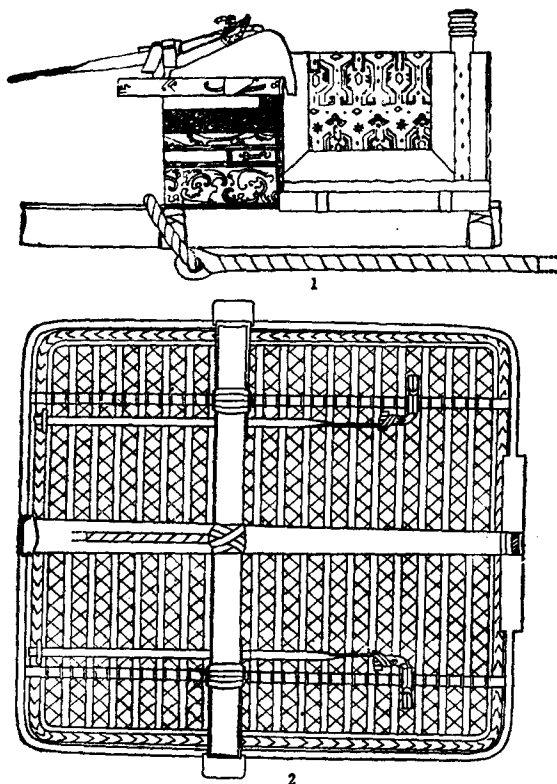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8 2 号铜车的前舆与后舆

1. 侧视 2. 仰视, 表示鞅绳后段的系结法

重要的情况都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。首先, 连接在服马两轭之内轭上的两条鞅绳就很引人注目。服马主要通过它来曳车, 这是以前所想象不出的。《左传·哀公三年》一再提到, “两鞅将绝, 吾能止之”, “驾而乘材, 两鞅皆绝”。从前总认为服马应各有二鞅, 合计为四鞅, 所以不理解《左传》“两鞅”之所指。现在才知道每匹服马均用单鞅曳车, 两鞅已经概括了服马承力之所在。这两条鞅绳的后端系在舆前的环上, 此环即《秦风·小戎》“阴鞅鋈续”之鋈续, 郑笺: “鋈续, 白金饰续鞅之环。”此环后部连着一根粗索, 系于轴之正中(图 1—8), 与《说文·革部》“鞅, 所以引轴也”之说完全一致。而据《小戎》毛传, “阴鞅”句中之阴系“揜轡也”。郑笺: “揜轡在轼前, 垂辔上。”孔疏: “阴、揜轡者, 谓舆下三面材, 以板木横侧车前, 所以阴映此轡, 故云揜轡也。”孙诒让则称之为揜舆版。但此前在古车上总找不到合乎这种条件的部件, 这次在 2 号车前舆的车轆上看到一块覆箕状的盖板, 恰好掩映着舆前那段较平直的辔即轡, 所以揜轡正是指它而言。反过来再看以前出土的战国铜器刻纹中的车, 如河南辉县赵固、江苏淮阴高庄、山东长岛王沟等处之例, 遂发现其舆前也都有揜



图 1—9 出东长岛出土战国铜鉴刻纹中的车

轨^⑨（图 1—9）。但倘若不是由 2 号车得到启示，只从那些简略的刻画中是难以辨认出此物的。

2 号车的驂马曳的是偏套，套绳分别沿两驂内侧向后通过前轡左右之吊环而结于輿底的枕上^⑩。此套绳应称为靳。《左传·定公九年》记王猛对东郭书说：“吾从子如驂之有靳。”杜注：“猛不敢与书争，言已从书，如驂马之随靳也。”所以靳才是驂马的套绳的名称。而靳的被认识，又使许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。如《小戎》“游环胁驱”之游环，旧本毛传释作“靳环”，郑笺：“游环在背上，无常处，贯驂之外轡，以禁其出。”2 号车之靳正在驂马背都接出一短带，带端系环，驂之外轡恰恰从此环中穿过，与毛、郑之说若合符契，故此环无疑即是游环。以前因为不认识靳，所以依通行本将游环解释为靽环^⑪。但这么一来，好几种鞍具的位置都连带着发生了错乱。同时，靳的被确认，也进一步证明一乘车上只有两靽，不与轴相连接的靳并不是靽。

至于《简报》所说的套在驂马颈部而系于服马轡上、用以防止驂马外逸的纆索^⑫，或即是鞮。《说文·革部》：“鞮，驂具也。从革、蚩声，读若聘蜃。”段注：“《虫部》蚩读若聘，则此蚩声读聘宜矣。不知何以多蜃字。聘蜃连文不可通，疑当为又读若蜃也。”按《彳部》：“𨔵，侠也。”段玉裁说：“侠之言夹，夹者持也。经传多假侠为夹。”鞮之为用正是将驂马夹持于服马之侧。

特别出人意料的是，2 号车的服与驂均自尾后牵一带经腹下系于轡或鞮上，这也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描写晋国的军容时说：“晋车七百乘，鞮、靽、鞅、鞞。”其中列举出各类鞍具，用以表示晋车装备的齐全。这里面提到了一种他处很少提到的鞞。据杜注：“在后曰鞞。”则上述后牵于马尾之带应为鞞。然而杨伯峻新注谓：“鞞同绊，音半，繫马足之绳。”晋军临阵之战车无自行系上绊腿之绳的必要。持此说者或引《楚辞·国殇》“霾两轮兮紮四马”为证^⑬。但《国殇》之出此语，应如王注所说，是在“己所乘左驂马死，右驂马被刀创”之后。其霾车紮马，乃是表现“终不反顾，示必死也”之志，也就是

下文说的“出不入兮往不反”、“首身离兮心不怨”之意。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与晋军完全不同，故此说恐非是。但如果不是2号车上把它表现得这么清楚，鞅为何物，将难以理解了。

2号车的服马和骖马均在额前的络头上装金质当卢。当卢背面的垫片上有刻文，自右骖至左骖，分别为“轡右一”、“道二”、“道三”、“轡四”（图1—10）。按轡字古音属元部明母，与轹字同部同纽，故轡当是轹之假字。《说文·车部》：“轹，引车也。”经传又多假道为导，《说文·寸部》：“导，引也。”所以秦车可以称骖为轡，称服为道。然而道亦训先，《文选·赭白马赋》：“飞轡轩以戒道。”李善注：“道，先也。”考虑到在古代的驷马车上，四匹马并不是齐头并进的，《诗·郑风·大叔于田》：“两服上襄，两骖雁行。”郑笺：“雁行者言与中服相次序。”孔疏：“此四马同驾，其两服则齐首，两骖与服马雁行，其首不齐。”清·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卷五：“上者，前也。上襄，犹言前驾，谓并驾于前，即下章之‘两服齐首’也。雁行，谓在旁而差后，即下章之‘两骖如手’也。”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正义也说：“骖马之首当服马之胸。”所以秦代将服马称为道，还有表示这两匹马的位置靠前的含义。在这次发掘中，前后两乘铜马车出土时，驾车之马的位置均为服马在前、骖马次后，特别是前车即1号车更为明显^⑧。不过轡即骖马虽然位置稍偏后，却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偏低，相反，当时的骖马可能比服马更受重视。2号车的两骖都在颈部套着金银项圈，而服马却没有。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中之车，亦仅二骖套有银项圈^⑨。马饰的丰俭与受重视的程度总该有所关连。再如《郑风·大叔于田》描写大叔驾车时，一开始就说：“执轡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”只言两骖，不提两服，亦可证调御两骖之得宜与否，对行车相当紧要。《左传·桓公三年》记曲沃武公“逐翼侯于汾隍，骖絿而止”。《成公二年》记齐顷公之车在鞍之役中“将及华泉，骖絿而止”。这都说明骖马较易受路边外物的干扰，故宜选强悍的马充任。并且，车子转弯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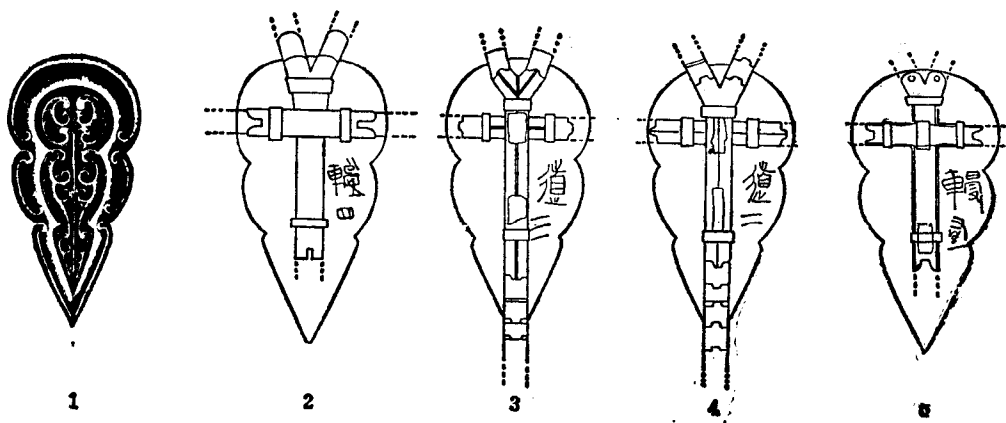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—10 2号铜车的轡

1.正面拓片 2~5.背面刻文

起主导作用的也是驂马。2号车的右驂在额顶立一装纓的铜杆，应即《续汉书·輿服志》所说用犛牛尾制作的“左纛”。它就是为了便于使四匹马一起转弯而设置的部件。但这里会提出一个问题：既然称为左纛，似乎就应该装在左驂头上，为何2号车却把它装在右驂头上呢？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战车一般均向左边转弯，即《郑风·清人》所谓“左旋”的缘故。孔疏：“必左旋者，《少仪》云‘军尚左’。”但战车为什么要左旋呢？这又和乘车者的位置密切相关。当一辆战车乘二人时，御手居左，甲士居右，如在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出土之T14号车所见者^②。若乘者为三人，而其中又有指挥作战的将领时，则如郑玄所说：“左，左人，谓御者。右，车右也。中军，为将也。兵车之法，将居鼓下，故御者在左。”^③当然，此仅就一般情况而言，例外的场合也是有的。但不论位置如何变动，车上居右之人即所谓“戎右”，常为手执戈矛的勇力之士。《左传·成公八年》杜注：“勇力皆车右也。”因此，当战车转弯时，配备武装的右侧应向外，使之仍能起到御敌的作用，即“左旋右搯”之所谓右搯；而没有武装只有御手的左侧应在内，以便受到保护^④。在进行车战时，左旋应是御车的常规。由此而产生的左纛之制，亦不应理解为左侧之纛，而宜理解为左旋之纛。此纛立于右驂头上，则左旋时纛自右向左催迫诸马，弯子就比较容易掉转过来。转弯时右驂所起的主导作用，在《说文》中已经指出。《舟部》：“服……一曰车右骹，所以舟（周）旋。”右骹即右驂。《马部》：“骹，驂也。”而由于自右向左折旋须以右驂带头，故又称“右还”。《周书·武顺篇》：“武礼右还，顺地以利兵。”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抑骛若通兮，引车右还。”其实，左旋和右还说的是一回事。

既然在行车时要求两驂更灵活些，更具机敏的反应能力，所以要选强悍之马。可是悍马难驯，因而2号车在两驂口中除安排一套普通马衔外，还另加一套带刺的杵形衔（图1—11）。《简报》将此物考定为概，是很正确的。《文选·西征赋》注引《庄子》司马注：“概，驂马口中长衔也。”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索隐引周迁《輿服志》：“钩逆上者为概，概在衔中，以铁为之，大如鸡子。”都说得极其明确。概又名𪔐。《说文·齿部》：“𪔐，马口中概也。”𪔐是齿相齧之意^⑤。当时是用这种螯口的带刺的概来加强对驂马的控制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说：“是犹无镳、衔、概、策、𪔐，而御𪔐马也”，而《盐铁论·刑德篇》则说：“犹无衔、概而御悍马也”，将前者列举的几种马具减缩成衔、概两种，其重点显然是概，可见该书作者认为没有概就难以制服悍马。

从2号车对待驂马的情况中，不难看出它们的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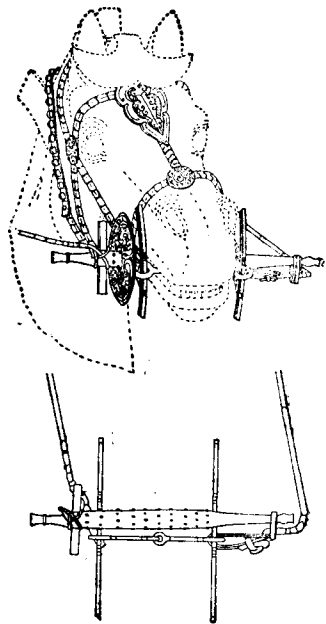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11 2号铜车左驂马所衔的概

位不同于服马。而在两骖之中，左骖似乎更被看重些^②。因为它位于左外侧，而御者的策持于右手，笞之不甚得便，故更宜选用“不待策辔而行”的“良马”^③。它应能对行车的各种意图迅速作出反应。所以《考工记·辀人》提出，终日驰骋而“左不捷”，即左骖不蹇倦，是鉴定好车的一项标准。

而御者的意图主要通过辔传达给马，无论骖马服马，都直接受辔的调遣。驷马车上的辔如何安排，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。按理四马八辔，而经传皆言六辔，如《小戎》就说：“四牡孔阜，六辔在手。”因此需要回答：一、余下的是哪二辔，对之如何处理？二、六辔如何安排，才能向四匹马同时发出一致的信号？由于2号车出土时辔已散断，原来的连接法并不十分明确，所以它并未给上述问题留下现成的答案。古文献中都说余下的是二骖之内辔。《邶风·干旄》孔疏：“御车之法，骖马内辔纳于鞅，唯执其外辔耳。骖马，马执一辔，服马则二辔俱执之。”《说文·车部》也认为：“辘，骖马内辔，系轼前者。”段注：“辘之言内，谓内辔也。其所入轼前之环曰鞅，《角部》曰：‘鞅，环之有舌者’是也。”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所出战车车前横木上均钉有两个供系辔用的鞅环^④。但2号车辔复原的初步结果表明，不是骖马的内辔而是服马的内辔系在前舆之掎轨的鞅爪上。因为骖马在转弯时是带头的，它的内辔应由御者直接掌握，而不应系结在车上某处；而服马在转弯时只要跟着骖马回旋即可，所以它的内辔倒有可能系在鞅上。但服马的内辔虽系于鞅，却并不意味着它只是徒具形式的备而不用之物，所以它似乎仍应当像战国铜器刻纹中所见到的车子那样，在辀前左右交叉一次^⑤（图1—12）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将四马之左、右辔分别集中在御者的一侧，在需要的时候，通过调辔使服马和骖马一致行动。何况2号车在衡轭交接处左右各有一银环，这两个环在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^⑥、甘肃平凉庙庄1、2号秦车^⑦、河南洛阳中州路战国车^⑧、湖北江陵酒店楚车^⑨上均曾发现，似乎服马之内辔交叉以后曾自此二环中穿过。但2号车复原时将此二环予以闲置，没有绳索穿过其中。关于这一点，似仍有进一步探索之必要。

总起来说，2号车的鞅具展示出了一一种前所未有的系驾方法。它和当时西方（指地中海及中近东地区）的系驾法全不相同。如果将系驾方法依其承力之最主要的鞅具来命名，则西方古车采用的是“颈带法”，车上无鞅，驾车之马用颈带系在轭上，轭连衡，衡连辀，马通过颈带负衡曳辀而前。此法的严重缺点在于颈带压迫马的气管，使驾车之马奔跑时呼吸困难^⑩。2号车的系驾法则可名为“轭鞅法”，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轭和鞅。虽然2号车上两轭脚之间系有颈鞅，但它并不起西方之颈带的那种作用，因为鞅从轭轳处向后拉，马的承力点落在肩胛两侧接轭之处。颈鞅无须系得很紧，它只起到防止服马脱轭的作用，曳车承力并不靠它。但由于轭承力较大，所以2号车在轭下铸出一层象征软垫的轭鞅。在河南浚县辛村1号西周墓上层车器中和北京琉璃河202号西周墓车马坑中都发现过它的痕迹。辛村报告中称之为“漆布夹膊”^⑪；发掘琉璃河基地的郭仁同志则名之为“膊”。